

■观点速览

短视频岂能公然挑战法律权威

近日，短视频平台频出“限高令新政”的相关视频，称“有内部途径，被限制高消费人员不用还款也能正常买机票、高铁票”。视频发布者中，不乏被认证为律所及法律咨询公司的账号。

“限高令”旨在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公平正义。然而，短视频平台上出现的所谓“限高令新政”相关视频，却公然打起了歪主意，妄图给“限高令”撕开一道非法的口子，这一乱象着实令人愤慨，亟待严管整治。

无论是发布此类信息的“工作人员”，还是寻求非法途径突破“限高令”的被执行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短视频平台也不能置身事外，要切实履行好内容审核的主体责任，利用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拦截、删除这类打着普法旗号实则违法诱导的视频，对发布此类视频的账号进行封禁处理，从源头上切断这类不良信息的传播链条。

(12月16日 华声在线 杜才云)

用科普直播“打败”坑老直播

中国青年报社一项调查显示，对于产品功能、质量好坏的评判，超四成受访者直言相比家人，老人更信任主播。

眼下，不少老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甚至“两眼一睁，看到熄灯”，在直播间购物也屡见不鲜。从养生保健、低价珠宝到古玩文玩，一些老人对“一眼假”的商品深信不疑，甚至“跟着了魔一样”。对此，各界已有共识：监管与关爱需双管齐下；陪伴和沟通才是“良药”。如何实操？想起脱口秀演员小鹿曾调侃自己的妈妈“全职在刷短视频”“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为此，她觉得自己要先拍一个短视频、上传，再转发给她。这固然是玩笑，但也提供了一种思路——老年人有主见，正面硬“刚”不行，只有适应他们的喜好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听得进。既然老人信任直播、短视频，那以此为形式的引导、科普可否再多些？

(12月13日 《广州日报》 夏振彬)

高效科技传播体系助力公民科学素养提升

□张江彩 阎晋 张蓉

科技传播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科技成果能否快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进而影响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

要想建立一个完善的、负责任的科技传播体系，就应该从政府的高度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组建一个科技传播体系，将政府新闻管理部门、各大科技媒体组织、各类专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种教育培训组织、专业学会、科技出版机构、科技咨询服务机构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组织机构作为核心成员，建立日常沟通联动机制，规范科技传播行动条例，促进科技传播的社会效能的发挥，实现通过科技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效应。

建立可量化的科技传播指标体系

要构建运转良好的科技传播体系,在实践层面就必须建立一套可量化的科技传播指标体系,这对于提升我国科技传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全面提升社会各界的科学素养也有着重要作用。

传播者系统，是指对科技信息进行探索、整理、发布和传播的机构和人员，既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从业人员，也包括大众科技媒介及从业人员等，他们的规模 and 水平对于科技传播能力有重要影响。其指标应包括提供科技信息的高等院校、科技机构、企业单位、科普的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等的数量和质量，参与科技传播的科学家及科研人员数量和数量和质量，媒介中科技传播从业者的数量和比例等。

传播内容系统，是指所传送的科技信息，包括科技知识、科技成果、科技政策、科研进展、科学方法、科技人物、科学精神等诸多领域。其指标应包括媒介中科技信息的数量和比例，各类科技内容的数量和比例，科技广告的数量和比例等。

传播渠道系统，是指传播科技信息的媒介体系，不仅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还包括展览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实体场所。其指标应包括报刊开设的科技版面数量和科技内容的比例，电台和电视台设立的科技节目的数量、时间档和比例，科普图书的数量和在图书市场的比例，科普场馆的数量和使用率等。

受众系统，是指科技传播信息的接收

者。受众的素质和教育水平对科技传播的效果有根本性影响。其指标应包括受众的受教育水平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参与科技活动的数量和比例，阅读科技信息和科普著作的数量和比例，对科技信息进行互动反馈的数量和比例等。

传播效果系统，是指科技传播活动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的总和，反映了科技传播被受众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其指标应包括报刊科技内容的阅读量和阅读率，广播科技内容的收听率，电视科技栏目的收视率，互联网上科技内容的点击量和点击率，科技传播内容的关注度和持续时间，通过媒介传播推广的科技成果和专利申请及转让的数量和效率等。

传播环境系统，是指科技传播行为能够顺利进行的多种状况和条件的总和，涉及国家和社会是否营造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取得良好效果的氛围和环境。其指标应包括立法和政府机构对科技传播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数量，政府机构对于科技传播领域投入的经费，媒介参与科技活动的经费和投入科技传播的经费，还应包括国家公民科学素养的指标数据，教育体系中科技领域的课程数量，科技行业从业者的数量和比例等等。

这些系统不可分割，互相依存,形成了科技传播统一的整体。科技传播也是一个过程,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环环相扣。因此,从整体出发,确立层次化、条理化的各项微观指标,建立科技传播的多级评估指标体系,对于提高科技传播的整体效能意义重大。

塑造多方良性互动的传播模式

从根本上而言，科技传播内容制造的源头，还在于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但是，目前我国的科技界普遍存在重科研、轻科普的现象，而且在体制上缺少和科技传播相结合的机制。总体来看，科技界与媒体脱节、科研机构与大众脱节的问题比较严重。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科技研究活动高度密集的中心，也是科研资源高度聚集、负责任的科技传播体系。科技传播社会功能的发挥不是自动的，它要依托于运转良好的科技传播系统，更需要从多角度对现有科技传播体系进行改进，构建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负责任的科技

传播体系。

要建立多方良性互动的科技传播模式，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利用好互联网信息交互平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人人都是自媒体。众多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媒体具有快速发布、广泛覆盖的优势，成为科技信息发布最快、影响最大的媒体集群，使得公众、政府、媒介、专家等多方互动交流成为可能。甚至有些媒介（如果壳、混知、酷玩实验室等微信公众号）通过互联网聚集起来的专业科技工作者群体，正在成为科技传播活动最活跃的主体，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科技传播效果，这也代表了一种良性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改善科技传播的外部环境

要实现科技传播的良性发展，还必须在机制上大力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现有资源从事科技传播活动，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技传播活动。这些机构和人员不仅应该积极组织和参与各项科普活动，近距离接触社会 and 公众，还要向公众及时传递社会关注的热点科技信息，帮助公众客观真实地认识科技信息背后的含义，承担起对科技相关事件评估的责任，引导突发科技事件造成的社会舆论。

在科技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建立专家与媒介的良性互动交流机制尤为重要，需要形成一种制度保障。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点，而且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科技专家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去感知公众需求，了解公众的疑问及真实想法，进而答疑解惑，启发新的议题设置；澄清误解，传播真实准确的科技信息，去积极参与科技传播的进程。

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公众对于获知科技信息的主动性越来越强，对于科技信息的了解也日趋个性化。面对这种情况，媒介也已不仅仅是科技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是沟通专家与公众的桥梁。要想使科技知识得到有效传播，并真正提高公众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媒介和专家就必须形成良好的协作，媒介既要把专家提供的科技信息真实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同时也要将公众的疑问和需求及时反馈给专家，从而完成良性的科技传播过程。

提升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的科学素养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原有传播者的议题设置权力随之被逐渐分散乃至失控,更多的普通传播者参与到需要一定专业性的科技传播过程中,科技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互相融合并时常发生转换,许多自媒体开始出现并蓬勃发展.各种信息开始爆炸式呈现,由于缺乏专业传播者进行科学的舆论引导,加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受众“过度介入”的问题,“错误”“误读”的多发性和突发性不断增加.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发挥科技传播的社会作用,必须大力提升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和广大受众的科学素养.我国科技传播事业要向前发展,提高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的素质至关重要.不少媒体的科技新闻从业者科学素养不高,缺乏科技常识和系统的培训,更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当前科技传播的发展.要提升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素养,就必须改进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的培养方法。

当前,我国大众媒介科技传播者还未形成职业化的队伍,许多从业者并不是科学技术专业出身,而是中文或新闻专业毕业,或者是半路出家从别的行业进入科技传播领域.而科技传播与其他领域的传播相比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对于专业知识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媒介必须建立和完善科技传播职业培训,以提高从业者的职业化水平.同时,应该鼓励自媒体与官方机构开展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科技信息传播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有机整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在财政上对科技传播媒介环境改进进行支持,不仅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周、科技展览等科技传播活动,还要拿出资金鼓励各种形式的有益的科技传播行为,比如设立大众媒介科技传播的相关奖项和发展基金,对科技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支持;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加大对科技传播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全社会鼓励形成尊重科学、相信科学、实践科学的风尚和精神,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张江彩系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作者阎晋系咸阳日报社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作者张蓉系咸阳日报社记者,教育周刊编辑部主任)

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

带你看看玉器背后的有趣历史

□张翠平



《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
出版单位：河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主编：杨伯达
定价：298.00（共三册）

内容介绍

《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的前身是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中国玉器全集》，全书以年代为序，总结同时期玉器的共性及个性，为分类、辨识、学习古玉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有助于读者做好横向的比较与总结，是古玉研究者、爱好者的实用工具书。

为什么人们常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鸿门宴上，刘邦为什么送项羽白玉璧？你知道古人是如何用玉的吗？河北美术出版社近日推出图文并茂、史料翔实的玉文化专著《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想必能带你从中找到答案。本书中收录的所有器物都是馆藏的出土文物，书中论文也均出自专业的文物考古研究者，有坚实的学术支撑，且详细标注了文献来源，确保了内容的权威性与可靠性。

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的玉文化参考书

我国不仅在史前时期就拥有琢玉工艺，还是全世界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河北美术出版社就推出了6卷本《中国玉器全集》，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此次再版的《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是在6卷本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校订和再归类。呈现形式上，增大开本，图版相对更大，器物细节展示更清晰；采取通脊软精装的装订方式，书页能够平铺展开，方便携带和翻阅。

本书由著名玉文化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杨伯达主编，并汇集了国内各大博物馆的权威人士共同参与编著。全套书共3册，分为图集和论文集两部分，按原始社会至明清时期的时间线编排，收录了1800余件玉器精品，并深入探讨了各个时代玉器的器型纹饰、制玉工艺、玉料特征等。图册由杨伯达撰写的概述、彩色图版、图版说明三部分组成。彩色图版图片印刷质量和色彩还原度极高，力求表现出玉器的温润质感和雕刻之精。论文集与图册互为补充，收录了杨伯达、云希正、陈志达等9位国内专家的中国古玉概论和专论共20余万字，是一套名家云集、图文并茂、资料丰富翔实的玉学专著。

本书文字朴实生动、简明易读，除对玉器形制的考究外，还穿插了大量有

关各个朝代经济社会生活、工艺水平、审美情趣的论述。无论你是玉器研究者、收藏家，还是普通的爱好者，这套书都能作为实用工具书和权威参考资料；无论你想探究玉器的种类，还是想了解玉器背后的有趣历史，也都能从这套书中找到答案。

玉器发展史上的“技术革命”

玉的硬度为6—6.5度，仅次于石英，一般的斧凿和刀刃很难打磨。曾有专家推测，由于打磨技术有限，在原始社会，玉器可能与石器一样被当作工具使用。杨伯达考证，玉器能够以工具“升级”为礼仪用器、装饰用器，可能得益于一次“技术革命”——砣机的发明。

余杭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白玉圆轮和青玉圆杆连接在一起的玉杆纺轮，转动起来与砣机的运动相同，可能就是良渚人磨玉的工具。砣机的使用，让良渚文化的玉器器型多达十几种，还出现了雕刻复杂纹样和通体镂空的技术，这都是其他原始遗址出土玉器上罕见或根本没有的。

我国玉器的精美程度，也从此随着砣机的技术革新而进步。从两三人共同操作的拉弦转动的跪坐式砣机，发展到由一人操作、双足踏动的“水凳”，琢玉工艺不断发展和提高。翻阅本书图册可见，从原始社会简单的玉串饰，到西汉令人惊叹的金缕玉衣、宋代的镂空雕玉饰器，再到明代的玉壶、玉碗……玉器用途的拓宽和样式的革新，背后是能工巧匠不断升级琢玉工具的“技术革命”。中国古代的匠师用智慧和巧手，把坚硬的美玉雕琢成了令人爱不释手的艺术品。

古人的玉佩不只是装饰

在古装剧或古画里，我们常能看到，玉以玉牌或玉佩的形式系在文人雅士的腰间。这些玉佩不仅是装饰，更是我国玉文化中“以玉比德”的鲜明体现。我国古人认为，玉的品质与君子的

品质最为相似，因此文人雅士都好佩玉，以彰显自己的德行。但是，为何玉会被道德化、人格化，成为君子的象征？本书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认为，这与儒家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德治”和“仁政”的儒家为玉赋予了許多美德。《礼记·聘义》记载，孔子认为玉具有仁、知(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主张，让佩玉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也让玉成为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玉之“仁”“德”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在汉代，玉被道德化的原因得到了集中阐释。东汉的《说文解字·玉部》认为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忤，絮之方也。”从这“五德”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认为温润光泽是玉的“仁”，透明度高、纹理清晰是它的“义”……将玉的物理特性与君子或自身的理想抱负和美好向往联系起来，体现出我国古人追求德行、向上向善的人生观和严于律己的精神操守。

玉器中的那些“小动物”

博物馆里那些栩栩如生、神态生动的动物形玉雕，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在古代，动物形或人形的玉雕被称为“肖生玉”。《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通过考证，对肖生玉背后的文化内涵等进行了阐述，读者可借此了解肖生玉背后的历史印记。

在本书“隋唐—明代玉器叙略”一章中，记录有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只辽代青玉双鹅带盖小盒。辽代的契丹族放牧征战都要骑马，他们常随身带着小型的玉盒，可能用于盛放药材，在长途跋涉的马上生活中缓解疲劳或用于急救。这件双鹅小盒出土于辽宁省清河门辽中墓室，工匠在椭圆形玉坯上雕出双

鹅交颈而憩的情景，其上用细线刻出羽毛状，栩栩如生。

本书图册中，还可见辽代一墓葬出土的卧熊，玉熊的髯与尾处呈棕褐色，是工匠巧妙利用了玉坯上的褐色铁锈斑作为熊的皮毛。据考证，这种保留玉面特征的雕刻手法在宋代很盛行，辽代玉工也受其影响。

秦始皇也是“玉器收藏家”

在“完璧归赵”的典故中，秦昭王（嬴则）得知赵国“得楚和氏璧”，便派人给赵惠文王（赵何）送去书信，伪称“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这个典故一方面说明秦王以强凌弱，另一方面也说明秦国有重视玉器的传统。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前，就收藏和田玉、和氏璧等宝物。《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38年，长信侯嫪毐诈用了秦王印信来调动县邑的军队。还有记载，秦代以前，民间都用玉作材料来篆刻印章；秦代建立后，天子使用玉料来制作印玺，群臣从此都不敢再这样使用了。可见，公元前238年已有玉玺。秦以玉为玺，且定为天子所独用，说明秦国的统治者对玉是十分重视的。

在著名的鸿门宴一事中，也有玉器的“身影”。公元前206年，项羽与刘邦宴于鸿门，刘邦离席后托张良送给项羽“白璧一双”，送给范增“玉斗一双”。本书作者之一卢兆荫认为，张良所送的玉璧和玉斗应属秦代玉器，可能是刘邦攻入咸阳后，从秦的朝廷府库中取走的。先秦时期，有“天子佩白玉”的礼仪规制，刘邦送项羽白玉璧，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玉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深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中国玉器全集（普及版）》中，还有大量关于玉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人文意义的论述，读者可以结合本书精美图片，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感受我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其中流传的中华文脉。

(作者单位：河北青年报社)